

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

# 西藏纪游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十五”国家出版规划重点图书

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

# 西 藏 纪 游

(清) 周霭联 撰    张江华 季垣垣 点校



中国藏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辛 钊

点 校：张江华 季垣垣

封面设计：李健雄

技术编辑：姜 宏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藏纪游/ (清) 周蔼联撰; 张江华点校.

-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6

(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

ISBN 7-80057-701-5

I. 西... II. ①周... ②张...

III. 西藏-地方史-史料-清代 IV. K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2468 号

---

## 西藏纪游

---

出版 中国藏学出版社

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4.875

字数 98 千

印数 2000 册

印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

书号 ISBN 7-80057-701-5/K · 128

---

定价: 8.50 元

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

---

钦定巴勒布纪略

钦定廓尔喀纪略

西藏奏疏

西藏纪游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理藩院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

钦定理藩部则例

有泰日记



ISBN 7-80057-701-5



9 787800 577017 >

ISBN 7-80057-701-5/K · 128 定价：8.50 元



## 《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编辑委员会

---

主 编 拉巴平措

顾 问 朱晓明 邓锐龄

副主编 马丽华 季垣垣（执行）

###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划）

|     |      |     |     |
|-----|------|-----|-----|
| 王维强 | 冯 良  | 毕 华 | 李建雄 |
| 陈庆英 | 陈燮章  | 赵云田 | 格 勒 |
| 索文清 | 索朗多吉 | 黄维忠 | 廉湘民 |

# 总 序

拉巴平措

涉及西藏历史的汉文古籍文献史料的大规模搜集和系统的整理，开始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那时，我国现代藏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才刚刚起步，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藏学研究基础史料的建设。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得以进行和深入的基础，但当时这个基础还很薄弱，远远不能适应科研工作的迫切需要。虽然有关西藏的藏汉文书籍、史料非常丰富，但一直未能得以系统的整理和出版。尤其经过十年动乱后，藏、汉文史料皆遭劫难，难以数计的汉文藏事档案和不少珍贵稿本正在不断散失，情况不容乐观；幸存的一些古籍由于久未重版，业已老化，无法提供使用；有些著作仅有手抄本或稿本存世，濒于失传；有关藏事的文献、档案更是散见于全国各地的图书档案部门，查找相当不便。因此，无论从藏学发展和西藏工作的迫切考虑，抑或从抢救文化遗产着想，都需要我们自己动手搜集整理。为此，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都从筹建伊始，就着手进行西藏学汉文文献古籍的抢救、挖掘工作，多年来，

依靠内地在资料、人才、工艺等方面的优势，广泛收集各类藏事文献。为尽快提供使用，在查找、搜集及确定善本、孤本、抄本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摘编、辑录、影印、重版、精楷手抄、缩微影印等方法，整理出版了《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三套有关藏事的文献古籍丛书，计 178 种 446 册，分别以线装、精装和平装印行，总字数五千余万字。如此大规模地整理藏学汉文古籍文献，诚为前所未有的，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欢迎和好评。

这些汉文文献古籍的问世，在维护祖国统一和反对民族分裂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广泛的影响，它们以无可辩驳的历史真实记载证明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文献古籍丛书的出版，还适应了刚刚开始进行研究工作的藏学界的急需，成为当时许多研究人员的案头必备，不仅为中国藏学的发展出了力，也保存了某些汉文古籍的本来面目和版本特色，使西藏学汉文文献的某些善本、孤本和手稿早日得以流传。但这开始于八十年代初期的搜集整理工作毕竟带有抢救性质，加上经费有限等各种因素，已出版的各种文本难免有草创痕迹，尚有不少不尽如人意处，如丛书出版以线装本和影印本为主，书价较高，私人购置不易；古籍的文字虽概括、简练，但与现代语语言是有距离的，且全部是繁体字，绝大部分又没有句读，这对从事藏事工作者中占多数的中青年成员来说，使用起来不无障碍；有些稿本、抄本为保持原貌，

并未进行校勘和应有的注释；重抄、重版书及大部头史书中的藏事摘编和辑录，因抢时间和急就章式的编辑，漏编、差误与疏忽也在所难免；即使是精装本和平装本，也由于受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印刷、装帧等都很粗糙简单，版式也不规范。总之，不足与遗憾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进步，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藏学研究已经迎来了光辉灿烂的春天，藏学研究队伍日益壮大，藏学研究的成果绚丽多彩，其中在藏学基础史料的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尤为明显，各地区、各部门陆续成编的藏汉文文献史料专辑和汇编正在为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便利。在藏学研究日益出现新局面的现在，汉文史料中的古籍整理也应该上一个新的台阶。有鉴于此，我们组织了专门的班子，将曾经编辑影印过的汉文古籍文献择其精要加以整理，重排、重校，增加注释，统一体例规范，编辑出版全标点校注本《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将其作为藏研中心的重点课题，并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有关西藏的文献史料数量浩繁，内容庞杂，涉及的领域广泛，根据现有的力量和条件，按照西藏三个文明建设的需要和学术科研的要求，我们把重点放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促进中国藏学事业发展的基础史料的整理。《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主要辑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典章类，如清代官修重要法典《钦定理藩部则例》，它是清代的民族法，从法律上规定了各民族的地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反映了清朝办



理民族事务的基本情况和经验，是祖国统一的重要史证之一，是从典章制度方面记述祖国统一的重要文献。二是军机方略类。方略是史料中极为详备、极具价值的一种，因其篇幅巨大、资料丰富，历来倍受史学家的重视。如《钦定巴勒布纪略》、《钦定廓尔喀纪略》、《平定两金川方略》等都是有关藏事的重要史籍，且都是官修史料，虽然有其局限性及修撰时人为的弊端，但因是当时发生事件始末最完整的记录，对时间、地点、人名以及各方政治往来、军事冲突等都有确切详尽的记载，庶可弥补藏文史料某些缺憾，并可与现在大量问世的各种藏文典籍相比较、考证、参订，还原真实的历史。三是入藏官员的奏稿、文牒、日记等，如《抚远大将军允禔奏稿》、《西藏奏疏》、《有泰日记》等。它们的作者是当时事件的直接见证人，所记载的一切都是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因其真实可靠，一向被研究人员视为不可或缺的参考。这些颇具个人色彩的撰文，视角和选材自有特色，可与正史两相参照，取长补短，对了解历史真相大有帮助。四是古籍文献的专题汇编、摘编、辑录及重要的西藏方志书籍重加整理或再版，为藏学研究人员和藏事工作者提供了尽可能全面的参考资料。这部丛刊所收录的古籍文献，展现的不仅仅是单个的历史事件，而且是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缩影。这些文献史料往往一文多事，除记录历史事件外，还涉及旧西藏的政治人文、疆域地理、宗教民俗、地丁钱粮、徭役差赋等多方面的内容，既可供多学科研究使用，也可为现代西藏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提供历史的镜鉴。

《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为简体字标点校注本，必将使读者面更为广泛，阅读和使用起来也会更加方便。二十多年前，我在西藏社会科学院任职时即已参与了这项工作的起步，看到它将以现代科技包装过的崭新面目重新问世，深感欣慰，并由此深切怀念为这项工作呕心沥血、将自己的后半生奉献给这项事业的陈家珽先生。这套丛书从搜集、整理到出版的过程，记录和折射出了二十多年前我国藏学研究起步时的紧迫与艰辛，反映了藏学基础史料建设正在一步步走向成熟。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搜集整理汉文文献古籍工作进行下去，为藏学研究事业铺路筑基，开拓中国藏学更加繁荣的未来。

《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即将付梓，兹略述缘起，是为序。

2005 年元月

## 前 言

西藏位于我国西南边陲，过去由于重山阻隔，地处穹远，交通极为不便。程途的艰险遥远，阻挡了大多数人的脚步，也遮住了人们探索的目光，使西藏在中外人士眼中是一个扑朔迷离的神秘世界。十七世纪以前，能有幸躬履其地，或朝佛或公务又能书其经历者毕竟太少，故历史上有关西藏的汉文古籍，鲜见官书以外的私人笔记游记类著述。唐人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是较早的著作，所述仍嫌太简略。直到清代，清廷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管理，设置驻藏大臣衙门、前后藏驻军等，内臣官员往返频繁，真正有关西藏的记载逐渐丰富，并流传开来。《西藏纪游》即是其中一种。

《西藏纪游》作者周蔼联，字肖濂，今上海市金山县人。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人二次侵藏，清廷派嘉勇公福康安为大将军，统率劲旅，大举深入西藏边境，将廓尔喀侵略军驱除殆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时任四川总督的孙士毅驻军察木多、打箭炉督运粮饷、调派军队，周蔼联为孙士毅的幕僚，于乾隆五十六年随孙士毅自京师至蜀，掌中书事。两年期间，他两次出入西藏，历经艰难险阻，于军旅倥偬之中成《纪游》初稿。周蔼联

在自序中写道：“军符稍暇，凡山川风俗，草木鱼虫之异，耳目所及，辄笔之，得百余条。”可惜这份初稿于跋涉数年后遗失在旅途中。直至嘉庆六年，作者“赴京，阻水柏乡旅中，兀坐，复追忆掇拾，汇而纪之”。尽管是追忆，但“身经目睹之事历历如绘，犹恍然在蛮荒雪岭间也”。

《西藏纪游》一书将作者于乾隆五十六年到五十八年间在藏区的所见所闻一一记载下来，涉及范围极广：风物胜景，山川地理，政治政体，军队编制，兵丁武器，城郭僻野，物产钱法，市肆经济，内外商贸，民生民计，婚丧嫁娶，风俗礼仪，宗教派别，寺庙僧侣，奇闻异事，经书典籍……可说当时的西藏社会风情一一展示，无所不包，是清代较早的记述藏区社会生活的游记，而且颇有人情味，极具人文色彩，与后来的那些辗转相传、相抄，道听途说的有关西藏记载自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不可讳言的是，这些记载虽面面俱到，但确系浅尝辄止，浮光掠影，每一面都深入得不够，应该说是非常简单。那么，在有关西藏的资料大量面世，西藏这块土地已是随时可去，那神秘的面纱也已大部分揭去的今天，这样一本充斥着过了时的信息、已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了真相的西藏的资料，难道还有它出版的价值吗？

回答是肯定的。它的特点就在于那个时代写的，反映了那个已逝去的我们无法真正了解的社会的面貌。因为是身历其境的人所记载，可信度就高；又因为作者细致的观察、细腻的文笔和独特的视角，将这一切极其生动、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所以它所具有的那种文

学的新鲜感是有些史籍无法替代的。现试举三四例说明之。

作者与噶厦的官员时有往还，涉及西藏官场的有些叙述就既形象又立体，读后印象深刻。书中写到噶厦在大昭寺的办公处所，每日饭后众噶伦聚集在一起议事，“一切公事皆用粉板记之，随议随书”。但议决的事情一定是有文字档案记录的，因为政府的文案据说是“每阅三年清厘”一次，“一过，将旧案焚弃焉”。噶厦的铁制公家大印储存在办公处所，印章使用时“必须四噶布伦或三、二人方可开用，不能私用”，表明当时噶厦公文往来时使用印章的慎重并有一定的程序。当时正值廓战，征调兵马是常事，如在近处戴琿催集，远处系文信传调，“遇急则用传旗，以箭一枝系白色哈达于上，飞递传催，无迟误者”。机密事用黑炭一块，“崇朝之间千里可达”。崇朝即一个整天，在那个年代可谓神速。西藏出身显贵的世家子弟称作“东科尔”，凡懂些藏史的人都知道，但对东科尔子弟的描写却不多见。本书中写道：“将辫发挽于顶心作一髻，如道士所挽……其服式，戴白布唐巾，白布短敞襟褂，腰系五色锦缎裙……耳挂绿松石串，长可尺余，价值千金，所乘马鞍鞢亦极华美。”东科尔又“皆通文义”，在“达赖喇嘛前有十数对”，“如古之侍子然”。这些年轻的贵族既有知识又出身高贵，平时跟随达赖左右，地位自然显赫，众人皆仰望之。而噶布伦、戴琿等官“必以世家为之。遇有差委公事，乌拉马牛、口粮皆自于所属百姓内挑取，贫者不能”。由此衍伸的一个具体事例对西藏



官场的实质作了极好的注解。书中谈到一个小家子弟凭着娴熟的弓马技艺考取了戴琫，本是得意之事，但官场中的出身等级观念使得跻身四品官的戴琫，在见到其“所属如琫、甲琫世家子弟”出身的下级面前“转须摘帽、下坐”，毫无长官的威风。其人无法承受这种压力，最终“以无力自养马匹辞退”。这种描述岂能是一句“西藏社会等级森严”“阶级观念严重”所可比拟与涵盖的，使人过目不忘。

本书有关西藏的刑法罪罚等介绍大多不脱旧志窠臼，而在不经意时流露出来的细微之笔反令人更感兴趣。如“藏铁匠打造小降魔杵最精，有结于椰珠手串者。然私造此物，其罚最重，甚至于斩”。作者赞许造出的高级藏纸“其洁白而厚，宽长三四丈者，惟前后藏达赖、班禅用以写经”。但这种纸“有私造、私售亦犯重辟”。更有意味的是对几个解京犯人的描写。廓战中，七世班禅尚年幼退避拉萨，留在扎什伦布寺的济仲喇嘛、堪布喇嘛等“在吉祥天母前占卜，称不可与贼战，致众心摇惑”，将堵御之众尽数撤散，致使扎什伦布寺金银财物、粮食、佛塔上镶嵌宝石等尽被廓尔喀人大肆掳掠而去。乾隆皇帝大为震怒，将为首之人在藏剥黄正法，并命将占卜惑众之从犯递解京城。作者在打箭炉见到了这四名正在押解途中的扎仓喇嘛，“时从西藏解京，频以果核掷地占之，询以主何凶吉，语咿呀不可辨”。读到此处不禁慨叹：因占卜而获罪解京，但仍习惯性地“频以果核掷地”推算自己未卜的命运……其实当时定以占卜惑众之罪是太严厉了些，这只是僧人应

对所有无能为力事务的唯一能力而已。为此获罪，而又以此来减轻内心的惶惑及对未来的恐惧，难道不令人感到可悲吗？

书中谈到藏传佛教在西藏的传播，与其它古籍大同小异，但对上下密院修习的一段叙述略补不足。上密院在小昭寺旁古树成林的习经场，下密院在木鹿寺。作者称为“上下经园”。“每园各种杨树五百株，其下每树坐一习经喇嘛，风雨不移”。园中设一台为喇嘛讲经之地。习经的僧人只在吃饭时才能出园，“每日二次”，至小昭寺饮酥油茶，食糌粑。“入园者皆选考经典熟习之人，戒律甚严。三年后考取堪布，即为正途出身”。考取的堪布虽有大小不同，但“皆得戴大方顶金笠，余戴珊瑚、蜜蜡者皆非”。看来这大方顶金笠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似今日之博士帽，戴珊瑚、蜜蜡顶子非堪布也。

清代的西藏，官方印章与关防等已广泛用于公文告示。即如司法上“达赖喇嘛及浪子蝦（朗孜厦）等类亦知出示晓谕”，“尾铃小印章，亦如官司之盖印”。所以当时在藏区民间尤其是官员中，私人印章已成为必备品，并有一定的装饰作用。这从书中对藏族图章用法的记载可略知一二。藏民常用图章，“凡奏记、书札封口处，铃用之”。图章一般都是铸铁为之，“光泽可爱，圆者居多”。章上刻有藏文，因作者不识，自然“一文纠结如虫篆”。印章上饰有印钮，“钮形如螭”，螭为古代传说中的无角龙，是印钮中较讲究的装饰。其印油更为独到，竟是用蔗糖和朱砂相配而成，但“鲜明胜朱

漆，经久不变，且无油晕”。这也是第一次听到。“印色以蔗糖和朱砂配成，贮以小匣，悬之腰间，如杂佩然”。看来印章匣已成了藏民腰间佩饰之一。其用法甚是简便可爱，“用时以手指拭津唾，蘸涂图章之上”。藏族互相赠送礼品也用图章作记，“凡以果品相馈遗者，用卡契布一方包裹，外融紫胶少许粘口，而以图章印于胶上，致远不脱”。可与今日礼品快递包装媲美。

书中数处写到藏族女性的勤劳与能干，如“西藏交易多凭妇女”，“番女负长桶汲水。樵苏、炊爨皆资女工，攀涉险峻如履平地”，“井臼、箕帚之事亦女一身任之”。时因两次廓尔喀战争，入藏的内地兵丁、民夫甚多，他们与当地妇女同居一事，在当时可能已不是个别现象。作者对这些女性无私的胸怀和她们的侠义勇敢精神更是赞美有加，“其女为之炊、汲、缝纫，操作甚勤，并有以所蓄赏囊为之营运者”。“不独资其炊汲，即有邮报过站或值夜深雪大不识路径，其女即策马代兵驰递，予曾亲见之”。“其人归时，番女或持酒远送数百里外，惟不能挈之同归耳。”谁能说这不是感情使然？“是以驻藏兵丁例得期满换班，亦有届期不愿更换、甘心老死口外者”。这些留藏的兵丁“至五六十岁以外，其饮食起居、语言状貌与番人无异。或遇内地人告以室家子女尚存无恙，其意似茫然不甚省忆”。中华民族间的融合，此之谓也。

《纪游》一书与它书最大不同之点，还在于它对十八世纪拉萨城区商业贸易的情形作了比较充分的展示。当时拉萨虽然“不设市肆，随地摊卖”，但仍可看到城

市商贸尤其是外贸是相当活跃的。“西藏与世隔绝”这句话在当时似乎是不适用的。拉萨何曾闭塞？它交易的触角几乎伸展到周边所有国家和地区，程途又何止千里。各地商人络绎不绝，仅从作者所描绘的外国人的样貌就可略知一二。那市场的喧闹似乎充耳可闻。当时外商中最多的是巴勒布人（即尼泊尔人，藏民称之为哔哔子），据驻藏大臣奏报约有千人以上在藏居住。除此之外，克什米尔、中亚乌兹别克斯坦、不丹、阿富汗等国商人也不少，还有拉达克人及从“辟展（今新疆鄯善）一路远涉万里至藏地”的新疆回民。可看出当时旅居在藏的各地商人不在少数。作者对他们的装束相貌描述极其生动。藏民称来自克什米尔和新疆的回民为“缠头回回”，他们与巴勒布人一样“用朱皮为履，画金彩其上，似履无齿，趺而曳之。坐则解置座旁，犹有古人解履登席遗意”。缠头人虽“幽目虬须，狰狞可畏”，但非常爱清洁，对鞋子“时时摩拭，无纤毫尘滓”。他们“来藏贸易即久居其地”，亦很好客，但有客至，就设水烟招待，“其筒以铜为之，大于碗，置诸案头，中窍一管，递相呼吸”。（由此可知，交易并不全在地摊，应是有店铺的，否则“案”从何来？）写巴勒布商人更是神情毕集，说他们“短衣窄袖”，戴的小帽“以毡片为之，锐顶无檐，面前略有折叠痕”，戴在他们头上是“望之欹斜不整”，而“鬓边往往倒插一花。每日早起，额间涂朱一点，谓可迓吉祥也”。可谓生动之极，活灵活现。不丹人则“多健壮，赤足，犊鼻褌（一种围裙式的反穿衣），佩刀，动辄争斗”。与